

张原：对《华夏边缘》的几点评论

● 张原

在当代知识场景中，要弄清什么是“人类学”，或什么是“历史学”，其实与我们去追问什么是“中国人”，或什么是“华夏”，一样地让人心生困惑。

有这样一句古话——“文如其人”，是说作者本人和他的作品往往是相互映照、勾连贯通的。对于王明珂的学术背景与他的著作《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我想这句话是贴切的。作为一个学者，王明珂处于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华夏边缘》属于“模糊的文类”（blurred genres）。边缘性与模糊性向来是相伴而生的，这也许正是一件事物中最能激动人心的那一部分。因此，面对王明珂这样一个特殊的学者，面对《华夏边缘》这样一本有趣的书，面对华夏这样一个复杂的民族，当我们要强行地为华夏划定一个清晰的边界，以一种刻板的分类范畴来归纳他们之时，随之而来的，将是尴尬的问题，另外还有有趣的启发。拿人类学说历史学的事“通过边缘来看中心”作为本书的要旨，反映了作者自己身处的地缘位置，也隐喻了这本书在当代学术场景中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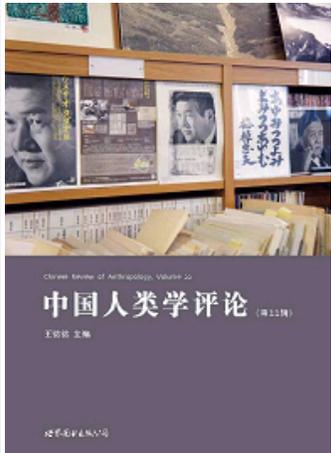
1997年，《华夏边缘》在台湾出版不久，就受到了整个华文学界的关注，不仅成为台湾学界的畅销著作，也引得大陆学者纷纷注目。人们不仅关心一个台湾学者在台湾出版的著作中诠释的中国人是什么，而且更关心他是如何诠释的。由此可知，当时《华夏边缘》在大陆的流传是多么地曲折传奇，甚而有点神秘。时隔九年之后，本书的大陆简体版得以正式出版发行。对于作者和关注本书的读者来说这都是一大快事，真正的阅读与交流可以开始了。

王明珂一再强调自己的历史学家身份，而且也一直认为《华夏边缘》是一本历史学的著作。相映成趣的是，关注这本书的人，特别是接受和肯定本书方法与观点的人，却大多来自人类学界。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华夏边缘》触及了“族群认同”这一大陆人类学界敏感的神经，特别是本书的第一章对当代人类学族群理论的清晰梳理，令大多数人类学的专业人士误以为这是一本地道的人类学作品。不过，细读本书的第一部分的三个章节，我们还是能够发现，王明珂的研究其实是带着深厚的历史学关怀的。通过点评主观论与客观论以及根基论者（primordialists）与工具论者（instrumentalists）之间的争执，王明珂指出，将“历史记忆”这一概念带到族群研究中来，无疑是研究族群认同问题的上策，因为族群认同是建立在历史记忆之上的。当然，历史记忆的研究也并非是中国历史学的正统，特别是在民族史学界，出于对“客观史实”的追求，学者们大多会耻于谈论“主观的记忆”。因此，本书不仅要说服人类学家们相信以历史的视角可以解决族群研究的问题，同时还要向历史学家们说明“我们赖以重建过去的文献与文物，其中所承载的是‘史实’，还是‘记忆’？”¹在王明珂看来，人类学的族群理论虽然需要得到历史学方法上的补充，但历史学的民族史研究更需要从人类学的族群理论中获得新的视野上的启发。对于民族史学界来说，如将人类学家巴斯（Fredrik Barth）的族群边界理论引入到民族史的研究中来，则意味着一次研究取向的颠覆。因为，当民族史学家也意识到，是族群的边界而非族群的内涵造成族群之时，溯源研究将变得没有意义，取而代之的正是王明珂在书中极力推崇的边缘研究。《华夏边缘》关注族群认同的研究，通过对人类学理论（主要是社会记忆与族群边界理论）的运用，巧妙地对民族史的传统研究进行批评。基于此，在方法论层面上，该书也展开对整个历史学研究的反思。王明珂对历史学的学科认同其实是明确的，在《华夏边缘》一书中，他无非是要拿人类学来说点历史学的事。

美国历史学家鲁滨孙（James Harvey Robinson）在《新史学》一书中呼吁历史学需要一场革命，要借助人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法研究人类以往的全部活动。²在研究的视野取向与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历史学能从人类学这里获得什么样的启发，这是作为历史学家的王明珂特别关心的问题。受益于族群边界理论的启发，王明珂针对民族史的研究，提出了用边缘研究来替代溯源研究的观点，除此之外，王明珂借用人学理论来进行研究，还有其更深的考虑和更大的抱负。在王明珂看来，历史学家必须思考“历史是怎么被言说的”，只有深究历史的记忆和叙述背后的社会情境和思想背景，历史研究才能摆脱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的历史学阴影，以一种理解与阐释的精神面对历史。因而对于王明珂来说，诠释人类学派的“文本分析”、Gulliver的“结构性失忆”、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社会记忆”等理论以及人类学的田野研究等方法无疑是其实现一种新的历史研究的法宝。

将文献解读与现实田野结合起来，是王明珂在《华夏边缘》一书中所追求的历史研究方法，虽然在本书中，这种方法并没有他的后一个作品《羌在汉藏之间》³实现得那么好，但我们还是能从中看到王明珂处理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的独到之处。在王明珂看来，首先，历史文献并不是一些真伪史料集结而成的“史实库”，而是一种“社会记忆”；其次，历史文献作为一种历史记忆，其实与口述历史一样是具有主观选择性的，而考古器物的制作和保存也是受当时人们的主观情感影响的；最后，历史文献与考古器物虽都具有主观建构性，其研究价值并没有失去，但问题在于要关注文献为什么要这样说，或关注为何器物主人要如此刻意保留这些记忆。⁴因而，王明珂不断强调应该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历史文献与考古器物，即研究历史文献与考古器物作为一种记忆的“文本”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文化的语境场景（context）中生产的，以及这些作为记忆文本的历史文献与器物在当时社会中的流动又是如何使得生产它的社会情境得以在现实生活中浮现，甚而被强化的。

王明珂的这种结合文献解读与现实田野的边缘研究，对照于史学界的前辈王国维先生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文献分析与考古资料的结合）的族源研究，两者间最大的不同并非是在具体方法上，而是在认识论上。前者强调资料的主观性，因而关注记忆的研究；后者强调资料的客观性，因而倾心于史实的考据。在某种程度上，王明珂的历史研究是有新意的。比如史学界围绕着“太伯奔吴”的“吴”到底是在何处产生的大量论争，使得这一问题成为一个史学疑案，而在本书的第九章中，王明珂并不关心太伯所奔之吴是在东南沿海之吴，还是在渭水流域之？



第22辑

往期查询

- 费孝通百年纪念专题
- 新书推荐
- 郭净文集
- 王铭铭文集
- 陈永龄纪念文集
- 李安宅研究专题
- 萧梅文集
- 庄孔韶文集
- 胡鸿保文集
- 翁乃群文集
- 林耀华百年诞辰专题
- 《探讨》目录
- 列维斯特劳斯逝世纪念专题
- 人类学的社会理论
- 藏彝走廊专题
- 吴文藻专题
- 王东杰文集

学术链接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所

CCPN中国比较研究网

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网

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

中国社会学网

中国学术论坛

人类学在线

版权所有：Cranth.cn 《中国人类学评论》杂志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

Email: cranth@gmail.com

电话：010 68936031

技术支持：[北京网站建设](#)——三幕天